



香港——「一個粵語金融大都會是這樣煉成的」

當我們打開電視，慣性收看的是粵語節目；香港的學校普遍以母語（粵語）教學；政府官員普遍以粵語向市民發言；普羅市民日常則以粵語交流。這個「粵語強勢」（田小琳，2012）的金融大都會是如何煉成的？我們必須回顧一點點歷史，勾勒香港的「大都會語言」（metropolitan language）（Fukuyama, 2020）——粵語的發展軌跡。

香港，廣東省南端一個漁村，鄰近村落的居民甚至操不同鄉音。自英國人於1843年開始建立維多利亞城，英語自然成為香港殖民政府的官方語言，但英語在香港自始至終從來未能成為普羅市民的生活語言。究其原因，香港超過95%為華人，而且鄰近廣東省，粵語也自然成為普羅人口的日常語言。所謂「華洋雜處，可能只是一廂情願的說法，其實香港開埠早期，種族分隔生活是當時的社會特色。大致上，華人與外國種族人士，都盡量互相保持距離。」（王賡武，1997）加上殖民地政府在管治初期推行的教育工作，本質上是港英當局培養他們所需各類人才和擴大英國對華影響力的精英教育，掌握英語是華人進入白領階層的敲門磚（余繩武、劉存寬，1994）。

粵語成為香港的主流用語還有其偶然性。一群操粵方言的蛋家人隨英國人進駐香港，憑着與英國人的關係與出色的營商表現，成為族群的精英，粵方言便權充這塊英國殖民地地方族群的主流語言（張振江，2008）。英語一直是殖民政府和商業精英階層的專屬語言，是一種統治階層和社會上層的象徵；粵語則是一種殖民地居民的生活語言。

粵語持續在香港佔據強勢地位，與兩條脈絡關係密切，分別是官方和普羅文化的共同努力。港英政府刻意重視粵語，1974

年把英語和中文都訂為法定語言，又在1978年推動九年普及教育，課堂教學則用粵語為教學語言。加上香港的電視台普遍以粵語廣播，造成粵語在香港和澳門都有強勢的語境。至於普羅粵語文化在20世紀70年代大行其道，甚至遠銷海外，造就粵語成為省港澳地區、東南亞國家，以至北美華人社區的日常語言。這是另一條促使粵語成為香港強勢日常語言的原因。

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各類粵語流行文化輸出外地，包括：電影、電視劇、粵語流行曲、粵劇、流行文學等，在東南亞、中國內地以至北美華人社區大受歡迎，造就粵方言在華人世界的影響力和重要性與日俱增。而這些流行文化的藝術表現形式扣扣相連，形成一個自20世紀90年代至1997年回歸前後，香港一股粵語強勢的「大都會語言」文化（Fukuyama, 2020）。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首先推動的語文政策是「兩文三語」。至於在90年代末推動的「母語教育」，終於在1998年正式落實^[1]，加上香港教育局推動的「普通話教中文」^[2]，都對粵語在香港的固有地位有莫大的挑戰。

「兩文三語」對香港的實質意義是官方語言由英語和粵語加上了普通話，普通話的法定地位確立了，亦即是說明了「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不變的是粵語仍是香港普羅市民的生活語言，仍是本地中、小學的日常教學語言。

-
1. 1998年教統局劃定全香港114間中學，可成為以英語授課的學校，至於其他學校則要以母語授課，即所謂中文中學。
 2. 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但由於涉及學理和客觀因素，目前，可由學校按本身的條件，以校本方式處理。
 3. 《香港基本法》「第一章 第一節」

另一個劃時代的轉變是推動「母語教育」，變相是把學校分級，由於全港只有25%中學可保留為英文中學，取錄全港最優秀的25%學生。若果你的成績優秀的話，自然可以入讀英文中學。若成績不達標，但家庭經濟能力負擔得起，家長還可以選讀「直資學校」，這類學校因應家長的需求提供英語和普通話教學，補償了這類學生家長對未來美好前景的需求。

除了香港語文政策的轉變外，香港跟全球先進城市同樣面對出生率持續下降，人口老化的難題。特區政府必須引入外勞解決勞工短缺問題。多年前已引入香港的家傭，主要來自菲律賓、印尼、泰國、孟加拉等。至於低技術勞工則以引入南亞裔為主，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等。據2016年香港人口普查，少數族裔佔全港人口8%，較十年前激增一倍^[4]，這類人士不少是舉家移居香港。高先生（化名），一位特區政府前高官，他曾長期從事少數族裔工作，對少數族裔在香港的生活頗為熟悉。據他指出：

我們有很多南亞裔學生連高中都讀不完；就算勉強完成高中課程，但都考不到DSE的水平，並不只是中文科，由於很多學校用中文教書，所以很多學科他們都聽不明白，所以整體成績都是低落的，於是又步父親的後塵。我記得一位NGO跟我說，他們做「3D」job：Dirty work，如清潔工人；Dangerous work，建築業工人；Difficult work，即是老闆見你大個子，便叫你去的工作，一個跨世代的貧窮便如此產生了。

4. 2006年7月，共有342,198名少數族裔人士在香港居住，佔全港人口5%。2016年居住在香港的共有584,383人，佔全港人口8%。

少數族裔人士在香港落地生根，甚至舉家移民香港，孩子的教育便成為香港教育界的新現象。他們或「空運到港」，或土生土長，教育為他們帶來融合本地的機會，抑或是造成第一波的歧視？將是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下不為人知的一頁。就讓我們走進學校教室，看看他們將要面對在港生活的第一道難關——學習粵語，一種號稱世上最難的語言。



每天早上，佐敦白加士街總有不少巴基斯坦工人在搬運。

學校內的「港式中文」

香港中學的辦學形式大抵分為：官立中學、津貼中學、直資中學、私立中學，但課堂語言通常只有兩種——英語和粵語。在母語教學政策下，114所中學被評為可以用英語授課（中國語文、中國歷史除外），也在香港社會上成為家長的心儀學校；其餘三百多所中學除了英文科，便要用母語（粵語）教學。不過，因應市場需要，也有部分學校（主要是直資學校）會以英語授課。至於中文科，則會因應市場需要，甚至改為普通話教中文，如果非華語學生入讀直資學校，簡直無機會接觸粵語。

粵語是全世界最難學的口語之一^[5]，但課堂內學生學習的港式中文是否等同粵語？田小琳（2012）認為「港式中文」是：「標準中文在香港這個社會區域的特殊書面語形式，行文中順暢地夾雜粵語，夾雜英語，顯示出港式中文的語體風格」。筆者以為，「港式中文」應在這基礎上，夾雜本地口語、俚語等。故此，「港式中文」是在粵語基礎上建立的一種香港地道的，可「讀」、「聽」、「講」、「寫」，甚至蘊含豐富文化元素的中國語文方言，你必須靈活運用當中的說話技巧，加上香港的地道文化，才算得上地道香港人。

有一位巴基斯坦的女生，土生土長，說得一口流利粵語。剛入讀本地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有一次，同學上課時問她借「尿袋」，聽得她一頭霧水。後來，經同學講解後，她終於明白「尿袋」原來是指手提充電器。她笑言：「若未能明白這些說話，也未能『埋到堆』。」要「埋堆」成為「自己人」，你必須緊貼香港的地道文化，才是地道的香港人。

作為學生，除了學習，還要應付考試。一位香港中學生經歷12年中、小學的訓練後，第一道考驗是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號稱「死亡之卷」的中國語文科「閱讀理解」試卷，更是讓學生望而生畏。當中的考材主要是文言經典篇章、現代典範白話文及香港本地著名作者的白話文佳作。此外，中國語文科還要考：寫作能力、聆聽能力、說話能力等。

「讀」、「聽」、「講」、「寫」能力考核，對於語文老師並不陌生。但對於香港學生來說，這四種能力又有其複雜性。閱讀

5. 梁旭明，《多元教育與作為教材第二語言的中文》，參見《粵語的政治》。

和寫作考核，材料主要以書面語考問，也要求學生以書面語作答。至於說話能力考核以及聆聽考核材料，都以口語形式出現，並要求學生以口語溝通。可是，粵方言或港式中文的口語和書面語頗為不同，對於一位年青人來說，把心中所想的口語轉化為書面語，也要經過一番思考。對於「空運到港」的少數族裔孩子，「讀」、「聽」、「講」、「寫」，可能就是四套不同的語文形式和表達方法。^[6]

一位在香港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巴基斯坦社區幹事阿文笑言：「就算香港學生都一半打柴，南亞裔99.9%死，當然一定有利君雅^[7]這類天才，但我們談的是普及教育。」（有關阿文的訪談，可詳見第二章〈社區〉和第四章〈人物〉）

加上，部分學校在初中實行「用普通話教中文」，^[8]對於一個新來港的非華語少數族裔學童來說，實情是「三文四語」。他的母語是本國語（或是鄉下話）；第二語文是英語；第三語文是粵語；普通話已是第四語。在課堂上用粵語教學，非華語學生尚且在課堂外有粵語語境，較易練習。至於普通話在香港缺乏語境，只淪為課堂內的一小時語言。有關普通話對中文科的干擾，一位任教以非華語學生為主的中學老師告訴我：「我教學生一個詞語『單車』，但GCSE（綜合中等教育證書）考試卻叫『自

6. 2021年3月，香港教育局宣布2021年9月起，香港中學文憑試四個核心科目將有修改。對於中國語文科來說，以往四張試卷刪減為兩張試卷，只保留卷一閱讀理解和卷二寫作能力；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卷四說話能力將刪除。

7. 利君雅是香港土生土長的巴基斯坦籍女士，曾在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新聞台擔任主播，後來轉任香港電台電視台主播，以敢言見稱，現已離職。

8. 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提到用普通話教中文是2011年以後的遠程目標，現時可由學校按本身的條件，以校本方式處理。



對香港本地學生是「兩文三語」的政策，對非華語學生來說是「三文四語」。

行車』；我教學生『士多啤梨』，但 GCSE 考試叫『草莓』，學生都搞到一塌糊塗。這正是我們的習用語和普通話規範漢語的麻煩。」

對於土生土長的香港學生而言，「單車」又叫「自行車」，只是粵、普說法、寫法不同而已，而且「單車」和「自行車」在詞性和意義的邏輯關聯也是合理的，對本地學生在學習上尚算不會造成很大困難，甚至有人認為這正能體現「一國兩制」。不過，對於一位「空運到港」的非華語學生而言，首先，弄清楚「車」字的寫法和意思，接着要了解「單」字與「車」的關係。接着「單」與「自行」的意思不盡相同，但聯繫到「車」字之後，原來指同一物件。這一系列的邏輯思維，對於一位以中文為第三語言，甚至第四語言學習的非華語學生，與以華語為母語的年輕人，完全非同日而語。

回歸原點——細說「香港中學文憑試」與「非華語中文教學」的關係始末

公開考試對於一個大都會來說，是一種社會認可的機制，是一種社會向上流動的階梯，也是一種淘汰的系統。「香港中學文憑試」（DSE，下稱「文憑試」）是香港特區政府推動教育改革——「三三四學制」的中途站，2012年舉行首屆「文憑試」，非華語學生同樣面對這個難關，而他們的中國語文考試是一個甚麼光景？

有別於以往的公開考試，「文憑試」設四個核心科目，分別是：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通識，屬必修科目。另外，學生通常選修兩個甲類科目，有水平高的學生可以選修三個甲類科目。也有學生選修所謂乙類科目，即所謂「應用學習課程」（Applied Learning, ApL），這類科目大抵以職業導向為主。對於一般本地學生而言，取得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成績便可以透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入讀香港各大學。香港特區政府也會以文憑試的成績作為投考政府工作的成績依據。

至於「香港中學文憑試」與「非華語中文教學」的關係脈絡，其實要從1982年開始談起。

1982年，港英殖民地政府才首次提及少數族裔在香港的教育，發表了題為《香港教育透視》的報告書，把少數族裔納入「特殊組別」，但少數族裔的教育問題一直未引起教育界廣泛關注（陳錦榮、梁旭明，2016）。少數族裔學生通常只集中於幾所以外語為教學語言的學校就讀。

2005至2006學年，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容許非華語學生可以進入本地主流學校。教育局於翌年（2006至2007學年）設立「指定學校」政策^[9]，第一年總共有15所學校接受邀請，申請為「指定學校」。

2007年，教育局採納「融樂會」建議，引入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國際普通中學教育文憑（IGCSE）及普通教育文憑（GCE）等海外考試，並允許中文程度不足以參與本地公開試的非華語學童，以海外考試中文卷成績代替會考和高考。^[10]

2008年，教育局推出第一本非華語學生修讀中國語文科的課程指引——《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不過，當時在教育界仍未造成多大迴響，因為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似乎只是非華語指定學校的關注事項。

2012至2013學年，香港中學文憑試開始。對於較遲開始學習中文或未獲充分機會修讀本地中文課程的非華語學生，教育局接受他們可繼續透過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中國語文科），考取其他中國語文資歷，以便接受高等教育及就業。^[11]當時，教育局已為合資格的非華語學生調低該科的考試費用，並於2010年實行。所以在2012年的香港中學文憑試，非華語學生可以用綜合中等教育證書（GCSE）（中國語文科），取代文憑試中國語文科，並以與本地學生同樣的費用應考該科。

9. 教育局給指定學校的支援，是用來協助學校累積經驗和發展成具備非華語學生教與學專長的學校。這些學校的經驗可以通過一個支援網絡與其他錄取非華語學生的學校分享，令本地所有的非華語學生從中得益。參見教育局，2012。

10. 有關非華語中文教育種種政策，詳見《公義的顏色》第三章〈語言障礙及中文教育〉。

11. 見教育局通告第23 / 2009號。